



李景煜 著

志 说

云南民族出版社



李景煜 著

志 说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云南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 董 艾
装帧设计 蒋高仪

志 说
李景煜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昆明市大观路 39 号 邮编: 650032)

云南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625 字数: 269 千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000

书号: ISBN 7—5367—1144—1/K·252 定价: 15.00 元

序

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 李 挺

叔光李景煜君 50 年代曾就读云南大学历史系，听过我讲课，与我有师弟之雅。那时，我年方不惑，很喜欢和同学们谈论古今。从交谈中，我发现叔光好学深思，识力毅力都很高，在学术研究中颇有前途。因此常对他勉励有加，期以远到。不料，他尚未卒业，便遭“错划”之厄，离开学校。从此，音问隔绝，不知近况者逾 20 年。80 年代初，叔光得到平反改正，到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于是，我们又重相见了。记得，乍见之时我握着他的手，惊喜交加。惊的是，昔年分袂时彼此都还少壮，而今皆已霜雪盈头，颓然老翁了。喜的是，叔光意气不减当年，一坐下便谈治学，好像未曾遭遇什么坎坷似的。啊，此情此景，杜工部的名作《赠卫八处士》，似尚不足以尽之。

叔光旋调省方志办省志总编室负责整理出版民国《续云南通志长编》。竣事后，转而主持省志总编室业务工作，并当任《云南省志》副总纂、云南省志总体规划五人小组组长、省志人物志主编……诸职。数年前退休后，复应聘继续主持省志总编室工作至 1991 年，仍任云南省志副总纂，编审省志书稿。这些工作的繁重是不问可知的，然而叔光却乐为之，优为之；且于工作之外，遍览前贤方志学的论著，尤致力于章学诚氏之书。如是覃思精研，寝馈方志之学者十数年。其间时以所获，发为文

242615

章多篇。今自选出 30 余篇，勒为一书，名曰《志说》，可谓为叔光代表之作。我与叔光时相过从，多已获先睹，但未窥全豹。今观全书，特色益著。试略陈一二。

方志之书，可说是一地方的百科全书。天文地理、农田水利、气候物产、文事武备、古今人物、沿革变迁……它无所不包。因此，人们对之不免求全责备，但又不许细大不捐，繁冗重复。这就很难折衷至当，饜读者之望。叔光对这个问题深思熟虑，比较研究诸旧志的优劣得失，撰《方志渊源与云南历代省志成书体例篇目辨析》，加以论述。又撰《方志学在云南的发展》，进一步评论云南诸旧志的体例，以及志书的功用、史与志的异同、修志者必具的素养，还着重指出“述、记、志、录”四体结构为新志之主要形式，……又撰《避免重复，允许交叉》一文，提出解决志书中常见的重复问题。撰《总纂问题》、《云南省志的总纂》和《编制云南省志索引刍议》三文，对修志中最棘手的总纂工作和索引编制，提出善处的具体方法。

叔光还撰写了一些具体指导和评论地县两级志书的论文，并对若干种州志县志加以商榷讨论。在《临沧县志序》一文中，叔光简要叙述了志书的源流，指出最近新出版的省内外志书的优缺点；目前修志普遍存在的问题，如体例不严谨，结构欠缜密；文风不优美，行文不简洁；图表不规范，数字不统一；……这些意见，甚有功于地州市县的修志工作。叔光治学严谨，对所审阅志稿，要求甚严。他针对修志当中的一些不良现象，特撰《新志书质量评定标准刍议》等文，提出按体例、资料、文风、规范、观点、印装六者打分量化，分别评为上乘、中乘、下乘三等。这种办法，科学客观，使浮夸造作、粗制滥造者流无所施其技。当然，这难免要获罪于人，但叔光为人耿介，对流俗不少假借，谁毁谁誉不顾也。

以上所云，不过是我读本书的一些感想和管见而已。至于全面评介，则须俟诸深于方志之学的博雅君子。

1995年元月9日写于昆医附一院病榻上

目 录

序	李 挺
---------	-----

第一部分

方志渊源与云南历代省志成书体例篇目辨析.....	(3)
方志学在云南的发展	(35)
《云南省志总体设想》的制定.....	(73)
对第一次主编业务会议上提出的问题的解答	(82)
切实提高《云南省志》各分志编纂质量的意见.....	(102)
避免重复 允许交叉	
——《云南省志》中若干交叉重复问题的 处理意见.....	(114)
在《云南省志》中设立《民族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 字志》的设想.....	(125)
《宗教志》编写中的若干问题	(135)
《云南省志·人物志》的编写	(145)
《云南省志》编纂质量的回顾与展望	(152)
总纂问题.....	(159)
《云南省志》的总纂	(174)
编制《云南省志·索引》刍议.....	(182)

第二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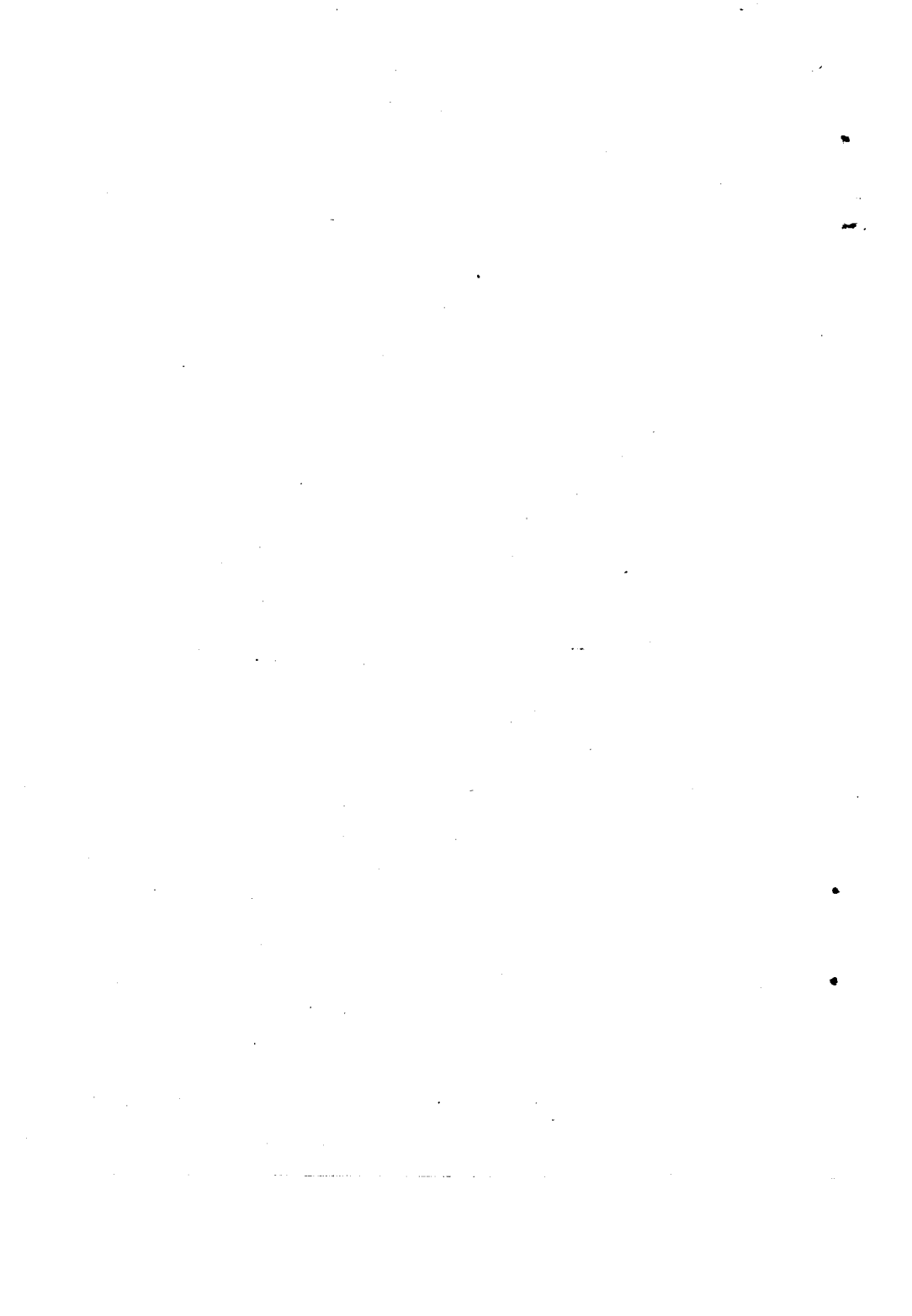
全省地州志篇目座谈会小结.....	(199)
-------------------	-------

从《楚雄州志·历史沿革》想到的·····	(205)
《临沧县志》序·····	(212)
《吕合煤矿志》序·····	(222)
评《永德县志稿》·····	(226)
评《鹤庆县志稿》·····	(239)
《红河州卫生志稿》读后·····	(249)
从体例篇目说起	
——《玉溪市志稿》读后·····	(253)

第三部分

把体例规范放在志书质量的第一位来考虑·····	(275)
新志书质量评定标准刍议·····	(286)
地方志的功用·····	(293)
分志·专志·专业志	
——对新编地方志中一个名称的商榷·····	(299)
驳《话说“修志”》·····	(306)
“说不清”论可以休矣·····	(309)
有志才修志·····	(313)
关于建立全国四级地方志书库与交换志书的倡议·····	(314)
我们是怎样整理出版《续云南通志长编》的·····	(318)
整理云南旧方志序例索引规划·····	(336)
《缅宁乡土志》跋·····	(360)
跋·····	(363)

第一部分



方志渊源与云南历代 省志成书体例篇目辨析

一 方志渊源

方志是一个地方全面情况纪实的书。方志一词，最早见于《周礼》“诵训掌道方志”及“外史掌四方之志”一语。由于中国方志源远流长，方志渊源，众说纷纭。概而言之，可别为多源说与一源说。分而言之，大体有以下几种：（一）源于《周官》，（二）源于《禹贡》，（三）源于《山海经》。略述如下：

《周官》即三礼中的《周礼》，又称《周官经》。《礼》是六经之一。孔子删订六经之后，经过秦火，《诗》、《书》、《礼》、《易》、《春秋》五部书已传下来，《乐》则失传了。《礼》本是春秋战国时代一部分礼制的汇集，故又称《仪礼》。西汉人戴圣从各种先秦古籍中采辑编定《礼记》49篇，称《大戴礼》，后戴德又编85篇，称《小戴记》，原传下来的《仪礼》称为《礼经》。西汉河间献王又得《周官》一书，此书分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个部分，冬官缺佚，补以《考工记》，为与《礼经》相别，又称为《周官经》，相传为周公所作。合《仪礼》、《礼记》、《周礼》，而称为三礼。其中也涉及今古文之争，这里不说，只说与方志关系。《周礼·春官》有外史，《地官》有诵训，《夏官》有训方及形方、职方等

官职，专门掌管记载四方九州所发生的事物，向周天子报告其利弊。故宋代大史学家司马光在为宋敏求纂修的《河南志序》中说：“《周官》有职方、土训、诵训之职，掌道四方九州之事物，以诏王知其利害。后世学者，为书以述地里，亦其遗法也。唐丽正殿直学士韦述为《两京记》，近故龙图阁直学士宋君敏求，字道次，演之为《河南长安志》，凡其兴废、迁徙及宫室、城郭、坊市、第舍、县镇、乡里、山川、津梁、亭驿、庙寺、陵墓之名数，与古先之遗迹、人物之俊秀、守令之良能、花卉之殊尤，无不备载。”①这段话指出，方志源头是《周官》的职方、土训和诵训。此后，这一主张得到更多的方志学家的赞同和发展。赞同者如宋人马光祖、元人黄潜、清人沈世枫等，发展者以章学诚为代表。章学诚不仅主张方志源于《周官》的职方、土训、诵训所记载的輿地之书，又在外史“掌四方之志”下说：如晋《乘》、鲁《春秋》、楚《梲杌》之类，都说明地方志是“一方之全史”。他的这一主张也有可议之处，但由于他在方志学上的卓越贡献，这一见解一直影响深远。其可议之处即他所说的晋《乘》、鲁《春秋》、楚《梲杌》是“一国之全史”。这里除了鲁《春秋》流传下来以外，其余早已佚亡，内容如何，后人未及读到，从何知其为“一国之全史”？如果以传世之鲁《春秋》比而类之，也有未尽全然之处。如《春秋》于鲁国事非关大义之所存者可以弃而不录；于天下事，虽与鲁国无关，也记叙于经传之内。另外，在体例上，后世的方志与鲁国《春秋》出入很大。说得确切一点，《春秋》的经传，可视为今天地方志中大事记的前身，它并不完全具备后来发展了的地方志书的完备体例篇目。所以章氏的立论有主观推断之嫌。而司马光的根据则更近于事实。因为在《周官》中有如下几条记载：（一）夏官司马：“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

蛮、七闽、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及辨九州之国，使同贯利。”（二）地官司徒下：“土训掌道地图，以诏地事。”（三）地官司徒下：“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总合起来，三个官职不仅掌握了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方面的诸要素，同时还涉及到“说四方所识久远之事，以告王观博古所识，若鲁有大庭氏库^①般之二陵”^②这类各地古迹遗事，确是粗具后世地方志的内容。王文韶光绪《续修云南通志序》说：“陈诗废而采风之典尚在，巡狩罢而土训、诵训之职固存。”周钟岳也在《新纂云南通志序》中说：“周官方志掌于外史，而柱下有百二十国宝书。所以记一方之掌故，备国史之要删。”

《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记载大禹治理洪水之患以后，将天下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按各州所在的方位、山河、薮泽、土壤、物产、田畴、交通、民族等作了简明的记述，并记载了各地的贡赋。是我国按地理分门类记载的最早专书。所以它也是后世方志的渊源之一。如《旧唐书·贾耽传》载，他在进《海内华夷图》的表中说：“中国以《禹贡》为首，外夷以班史发源。郡县记其增减，藩落叙其盛衰。”又如唐李吉甫纂《元和郡县志》也是按《禹贡》分九州之例，将天下分为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淮南、江南、剑南、岭南、陇右等十道来记述。宋代王存纂《元丰九域志》也依《禹贡》九州之别，将天下分为四京及京东、京西、两浙、江南、荆湖、梓州、夔州、福建、广南诸路来记述。元人张铉在至正《金陵新志》的修志本末中说：“古者九州有志尚矣。《书》存《禹贡》，周纪职方，春秋诸侯有国史，汉以来郡国有图志。图志兼记事记言之体，自山川、物产、民俗、政教、沿革、废置、是非善恶、灾祥祸福，无不当载。”清人周中孚所著《郑堂读书

记》卷二十六《华阳国志》条说：“《华阳国志》是因摘《禹贡》‘华阳黑水惟梁州’句之二字以名之也。”元人朱思本在所撰《九域志·自序》中说：“暇日因取群籍，参考异同，分条晰理，一以《禹贡》九州为准则的，乃以州县属府，府属都省，以都省分隶九州焉。”从以上这些议论中，可以看出很多方志编撰者都十分明确地表明了他们是祖《禹贡》而为书的。

此外，还有把《禹贡》和《周官》同视为方志之源的。如谭钧培在续修光绪《云南通志序》中说：“地志其史家之流亚乎？《禹贡》别九州山川疆理，辨物产以定壤赋，实为古今地志之祖；《周官》司检职方，掌天下图以达山林川泽，辨四夷八荒而周知其利害，诵训掌方志以诏王，司徒掌土地人民之数以佐王忧邦国，则地志之法莫详于成周。”

关于《山海经》，也是向来讨论志书源流时为大家所提到的一部书。此书成书时间较长，最晚当在战国时已有成文记载，经过秦汉两代又有所增补。全书3万余字，有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中山经（合称五藏山经）、海外南经、海外西经、海外北经、海外东经、大荒东经、大荒南经、大荒西经、大荒北经、海内经等共18卷。历来注此书者，代有其人。近人袁珂有《山海经校译》，综诸家之长，断以己意，虽与传统校注方法有相背之处，但能使人读通全书，在整理古籍方法上，是一种大胆的尝试。这部书是一部怪书，《镜花缘》一书中所描写的海外各国情况，大部取材或受到《山海经》的启示。《山海经》字数不算多，但内容却十分丰富。它以古代的巴蜀楚地为中心，旁及许多地区的邦国40，山550，水300余，对这些地区的风土人情、物产、祭祀、巫医、神祇、怪异等，许多奇怪的鸟兽草木的名称性状，还有一些历史人物的世系及活动，都作了记载。由于古代的书是用竹简木片书写后用绳子在首尾连系起来，年

深月久，绳子断了，再次连起来时就会产生错简的情况。古时的文字只有少数脱离生产专门进行占卜的巫者祝卜之类的人掌握，错了就会延续下来，无人更正。也有因长期使用把竹简木片磨损、折断、遗失而没有补上的情况。这些都给后人增加了读书的麻烦。司马迁就发出过“《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的慨叹③。汉代以后，历代经学家、注疏家、考据家进行过大量的整理、考据、注释工作，都无法把它通读下去，甚至越弄越复杂了。东汉以后，虽然发明了纸来代替竹简木片，由于印刷技术的发明运用是十二三世纪的事，在此之前的所有著作，都靠人工手抄，那时又没有标点，从断残的竹简上抄到纸上，又按注疏人的认识断句并加以注释，已难免加上一些错误。再经过几番传抄，有的把注文当做正文，有的多抄1字，有的少抄1字甚至1句或1段；有的颠倒了次序，有的用流行字、异体字代替古字。这样抄一次书，又增加一些错漏，后人越来越难读懂了。以致清代修《四库全书》时，把它归不了类，最后勉强安在小说家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此书“多参以神怪，故道藏收入太元部竟字号中。究其本旨，实非黄老之言，然道里、山川，率难考据。案以耳目所及，百无一真，诸家并以为地理书之冠，亦为未允。”可见在此书的归类上当时是颇费斟酌的。据《隋书·经籍志》载：齐“陆澄聚《山海经》以来一百六十家之说，依其前后远近，编而为部，谓之《地理书》。”又宋神宗时王存纂《九域志》，绍圣时黄裳以该书所载甚略，奏请补缀遗缺，诏“秘省录《山海经》等送职方检阅”④。说明他们是把《山海经》作为地理志类的。

古人所著地志之书，体例上还很不完备，各人按其所尊崇者为圭臬，故有单指一书作渊源的事。从方志学发展到今天的情况看，上列三书中，不能说只有哪一种才算得方志之源，应

该说方志是吸收诸家之长而自成体系的。因为《尚书·禹贡》偏重于记各地物产，不记风土人情；《周礼》职方等只记地理，间及“四方所识”，不记人物；《山海经》既记山川风土人情，又记人物世系、奇事异闻、神话，在门类上比前两书齐全，但它毕竟是支离破碎，真假难分，未可作为信史，不能与真正意义上的方志等量齐观。方志有完备的体例，是一方之全史，且重在纪实，不事虚夸，而上述三书各有不足，前两书实而不全，后者较全而不实。虽然如此，它们都对后世方志有很大影响，这是不可讳言的。

除三书外，还有许多学者把《吴越春秋》、《越绝书》、《华阳国志》等书作为方志的先河，似又不如前三书的重要。《吴越春秋》为后汉赵晔撰。他以《国语》、《史记》的记述再加所采访的佚闻传说，纂为一书。上篇记吴国事，下篇记越国事，故称《吴越春秋》。《越绝书》不著作者姓名，从书末的藏头诗析断，为后汉袁康及吴平2人所撰。此书记载吴越人物史事。《华阳国志》为东晋常璩作，分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公孙刘二牧志、刘先主志、刘后主志、大同志、李特雄期寿势志、先贤士女总赞论、后贤志、三州士女目录等篇，记述了汉晋间四川、贵州、云南这一广大地区的总体状况，在内容上已较《吴越春秋》及《越绝书》充实，体例也完备得多。从清代的廖寅到现代的范文澜、李泰棻、傅振伦等学者在研究方志源流时都提到过这三部书。总起来说，作为方志的最早源头应以《尚书·禹贡》、《周礼》、《山海经》三书为导源，至于《吴越春秋》、《越绝书》与《华阳国志》则是在前三书的影响下派生的专书，属于方志的流而不是源。道理很简单，首先，在时间上前三书最早而后三书较晚；其次，在体例上各具特点，各有不足，多偏于史，而少于志。后三书可谓志书的前驱，不能视作

志书的渊源。章学诚说志是史的具体而微，是很有见地的。中国史学在司马迁创立纪传体的《史记》之后，其体例一直传到清末民初，在篇目上各代都有些增减，是适应当时的实际情况。地方志效法于史书，受到正史的很大影响，故有“志乃史体”之说，确为要言不繁。

不能指望从任何一部先秦古籍中找到近代意义的方志，凡事都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地方志也如此。它是在不断的实践中接受有关边缘学科的发展成就而不断地充实完善自己才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的。章学诚的功绩在于把方志的地位提高到与六经和正史并列，创立了作为一部志书必须具备的篇目要素——三书体例。而这些都是客观社会发展的要求和从实际出发的必然结果。今天我们要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创新，就是从今天的实际出发。

二 11 部云南官修省志的成书及其体例篇目

云南比之全国，文化晚开，向被视为南蛮之地。但在纂修地方志上并不落后。从明代起，云南省志即遥遥领先于全国。这是由云南政治经济的总发展形势决定的。从楚将庄蹻开滇起，云南的历史经历了几个明显的阶段。汉晋时期是中央政权向云南经营开发时期，隶属关系比较松散，南中部族及大姓势力雄厚，叛服无常，中央政权在云南设州郡、开交通、驻军队、建政权。唐宋时期，则是地方政权从半独立（南诏）到完全独立（大理国）的割据时期。从元代灭大理政权置云南行省后，经过明清两代的大力建治开发，云南与中原凝为一体。这种政治经济发展的总形势反映在作为上层建筑一个方面的地方志上也十分清楚。元代以前，记载云南一方之志书极少，可数者有《永